表示虚拟企业各知识主体之间的知识互动行为所导致的知识转化与知识创新,同时提出了虚拟企业内部学习过程的“学习螺旋”模式。[38]

(六)其他重要观点

其他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新观点。常荔把知识链界定为知识流在不同市场主体间转移与扩散的集成、整合与创新的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网状结构模式,并把知识链视为研究知识扩散与转移网络的基本单元;[7]122-126刘刚将产业链与知识转移与创新原理结合起来,提出产业链中知识转移和创新结构是一个“社会化—外部化—组合化—内部化(SECI)”的双螺旋结构;[39]胡婉丽建立了基于研发过程的知识转移对称模型,[40]徐金发等则从文化、战略、组织结构和过程、环境、技术和运营等五个方面构建企业的情景维度,提出企业知识转移的情景模型;[41]王开明则强调中介媒体在知识发送和知识接受两个过程的连接作用,并提出知识转移成本的观点;[42]魏江提出了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模型,并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SEM)分析方法,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和修订,揭示了信任、人际关系、激励、决策者态度、知识管理系统、知识吸收能力六种要素之间的量化关系。[43]吴晓波从系统、动态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时间(产生、转移、应用、更新和创造),知识特征(隐性,显性)和环境(个人、团队、组织、组织间)三个基本要素,将知识管理的概念三维立体化,[44]为知识转移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

## 四、结论与述评

知识经济凸显了知识的重要作用,而现代科技所表现出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特点,决定了任何单一组织都难以同时具备创新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同时,全球性市场竞争的高度不确定性,高技术研发的高投入和高风险特点,技术寿命周期的不断缩短,也促使企业寻找各种途径,与其他组织进行合作,获取知识,协同创新。因而知识转移研究是当今知识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

国内知识转移研究起步于1995年,2000年之后发展迅速。总体来看,基本属于借鉴国外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研究集中在组织内部知识转移和组织间的知识转移。其中组织内部知识转移重视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在个体、群体和组织之间的转换过程,SECI模型是很多研究的理论基础。相对而言,更多的学者研究知识在不同组织之间的转移过程,这一点是与当今社会不同组织之间合作创新的趋势是一致的。学者们的研究视角非常广泛,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知识转移的过程机理、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和促进知识转移的对策措施,总体来看,学者们的观点和结论也是基本一致的。如果考虑到战略联盟、虚拟组织、企业集群、区域创新系统等是创新网络的具体形式或者是紧密相关的概念,相当比例的文献涉及到创新网络的知识转移问题。在促进知识转移对策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共同愿景、社会资本、信任关系、互动学习、转移通道、激励机制和创新平台等方面,企业的学习能力和组织之间的互动学习受到广泛关注。但是从创新网络的整体高度来系统探讨如何构建有利于知识转移的政策环境、运行机制、激励机制、评价机制、维护机制,这方面的系统研究则乏善可陈。因此,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值得深入探索的研究领域。

关于知识转移的研究方法,国内学者普遍采用的是定性研究,定量分析和数学模型较少,案例分析也不多见。原因在于知识转移特别是隐性知识的转移具有复杂性、无形性、情境嵌入性和创新性的特点,知识转移的数量和质量难以准确测量,没有公认的数据采集和量化标准,因而研究结论缺乏足够的信度和效度。在仅有的几篇涉及到数学模型方法的文献中,唐方成利用虚拟实验建立了知识转移与网络组织的动力学行为模式,卢兵建立组织间隐性知识转移的微分动力模型,魏江通过问卷调查和结构方程分析建立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模型,都是非常宝贵的探索性工作。如何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知识转移进行广泛而深入的量化研究和实证研究,仍然需要大量的工作。

## [参考文献]


[1] Hamel, G. Competition for competence and interpartner learning withi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1 (12):83-103.

[2] Drucker, P. The post-capitalism [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 1993:5-10.

[3] Argote, L, Ingram, P. Knowledge transfer: a basis for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forms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0, 82 (5): 150-168.

[4] 吴冰,王重鸣.知识与知识管理:一个文献综述[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1):57-61.

[5] 张福学.知识管理导论[M].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1.

[6] Davenport, T H, Prusak, L. Working knowledge: how organization manage what they know [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8.
[7] 常荔,邹珊刚,李顺才.基于知识链的知识扩散的影响因素研究[J]. 科研管理, 2001, 22(5).
[8] OECD.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M]. Paris: OECD, 1996:12.
[9] Nonaka, I, Takeuchi, H.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65-89.
[10] Von Hipple, E. Sticky information and the locus of problem solving: 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 [J]. Management Science, 1994, 40(4):429-439.
[11] Szulanzki, G. Exploring internal stickiness: impediments to the transfer of best practice with the firm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17: 27-43.
[12] Simonin, B L. Ambiguity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in strategic alliances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20: 595-623.
[13] Prahalad, C-K, Hamel, G.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0 (May-June): 79-91.
[14] 张莉,齐中英,田也壮.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及转移过程研究[J]. 情报科学, 2005, 23(11):1606-1609.
[15] Cummings, J, Teng, B-S. Transferring R&D knowledge: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knowledge transfer success [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3, 20:39-68.
[16] 唐炎华,石金涛.国外知识管理研究综述[J]. 情报科学, 2006,24(1):153-160.
[17] Nonaka, I, Konno, N, The concept of "Ba": Building a foundation for knowledge creation [J].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1998, 40(3):40-54.
[18] Gilbert, M, Cordey-Hayes, M.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to achieve successfu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J]. Technovation, 1996, 16 (6):301-312.
[19] Dixon, N. 共有知识:企业知识共享的方法与案例[M]. 王书贵,沈群红,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02:31-33.
[20] Carayannis, E G. Fostering synergies betwee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rial and organizational cognition: The role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J]. Technovation, 1999, 19(4): 219-231.
[21] Szulanski, G.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transfer: a diachronic analysis of stickiness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0, 82(1): 9-27.
[22] 肖小勇,文亚青.组织间知识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J]. 情报理论与实践,2005,28(4):355-358.
[23] 汪应洛,李勖.知识的转移特性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2(10):8-11.
[24] 肖小勇,李自如.基于知识特性与转移动机的知识转移机制研究[J].社会主义研究,2005(2): 111-114.
[25] 汪忠,黄瑞华.合作创新企业间技术知识转移中知识破损问题研究[J].科研管理,2006,27(2): 95-101.
[26] 卢兵,岳亮,廖貅武.组织间隐性知识转移的微分动力学模型[J]. 系统工程,2005,23(11):44-48.
[27] 林莉.知识联盟中知识转移的张安因素及应对策略分析[J]. 科技导报,2004(4):29-32.
[28] 张亮.知识型战略联盟中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其对策研究[J].市场周刊,2005(8):68-69.
[29] 奚雷,彭灿.战略联盟中组织间知识转移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6(3):166-169.
[30] 李琳,方先知.产学研知识联盟与社会资本[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5(8):5-8.
[31] 骆品亮,周勇,郭晖.虚拟研发组织的知识转移机制研究:一个文献综述[J].研究与发展管理, 2004,16(5): 18-25.
[32] 朱伟民.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中的知识转移[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6(4): 38-41.
[33] 徐占忱,何明升.知识转移障碍纾解与集群企业学习能力构成研究[J].情报科学,2005, 23(5):659-663.
[34] 黎继子,蔡根女.技术创新网络与隐性知识流转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4,16(5):53-57.
[35] 唐方成,席酉民.知识转移与网络组织的动力学行为研究[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6(5):122-127.
[36] 易法敏.核心能力导向的企业知识转移与创新研究[M].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134.
[37] 胡汉辉,潘安成.组织知识转移与学习能力的系统研究[J]. 管理科学学报, 2006, 9(3):81-87.
[38] 彭灿.虚拟企业中的组织间知识转移与学习[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05(3):10-12.
[39] 刘刚.基于产业链的知识转移与创新结构研究[J].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05(11):13-17.
[40] 胡婉丽,汤书昆.基于研发过程的知识创造和知识转移[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04(1):20-23.
[41] 徐金发,许强,顾惊雷.企业知识转移的情景分析模型[J]. 科研管理, 2003(2):66-73.
[42] 王开明,万君康.论知识的转移与扩散[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00,25(10):2-6.
[43] 王立生,任辉.基于网络视角的跨国公司转移机制研究[J].技术经济,2005(8):13-16.
[44] 吴晓波,郭雯,刘清华.知识管理模型研究综述[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2,14(6):52-58.

[责任编辑:王继洲]

# 卢卡奇本体论思想的渊源

刘 明 文
(中国石油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山东 东营 257061)

[摘　要] 卢卡奇的本体论思想主要来源于黑格尔的历史本体论和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社会存在本体论,只有向着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复归,才能从根本上代表当代本体论研究的正确方向。

[关键词] 历史本体论; 黑格尔; 马克思; 社会存在本体论
[中图分类号]B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 - 5595(2007)01 - 0068 - (05)

对于在传统思维中有着望文生义的国人而言,在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定历史阶段来谈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终结论"① 应该说是既不符合国情,也没有兼顾到民族情感,因而这一命题缺乏积极的现实意义。毫无疑问,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式是我们能够接受的选择。我们之所以更倾向于接受广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不仅是其在源头上与当时以正统自居的第二国际的理论家、苏联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更重要的是它对于我们思想的启迪是不可估量的。也就是说,只要西方思想界尚有对于马克思所代表的事业保持某种程度的敬意,并从中汲取思想的来源,那么,由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开启的研究方向和对话潮流就依然对我们发生着影响。

## 一、卢卡奇在本体论来源上的选择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与继承

### (一)卢卡奇在本体论的来源上对马克思、黑格尔的继承与选择

尽管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不同的理解,可是人们对于卢卡奇(Lukacs,Geory1885—197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的开创性地位却是一致肯定的。尤其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为本体论的肯定性回答给予现代性思想以重大的影响。

卢卡奇之所以在本体论的来源上选择黑格尔和马克思,其理由大致有四点:一是马克思思想形成时期的重要争论,使它成为不可避免。马克思的思想到底是来源于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 尽管今天已经有了一个确切的回答,然而在 20 世纪理论争锋的岁月里,这是一个必须有极大勇气才能回答的问题,因为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已经在马克思思想的来源处贴上了费尔巴哈的标签。二是黑格尔所遭遇的不公正的"死狗"般的待遇,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层面上来拯救黑格尔的成就。在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方面,卢卡奇所遭遇到的历史情况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即将黑格尔当作"死狗"看待,这种做法是自负的、平庸的模仿。三是在确定的历史条件下,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理论关联直接展示着西方文化的底蕴,并进而影响到现代西方文化的走向。黑格尔代表着西方理性主义集大成,费尔巴哈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支脉而已。现代西方哲学尽管流派繁多,但都离不开对黑格尔和马克思遗产的继承。四是批判教条主义、回到马克思的时代需要。在斯大林时代,特别是《联共(布)党史》出版后,官方的哲学成了对斯大林著作的注释,马克思、列宁的思想仅仅是以提供引文的形式出现,这就产生了一种完全任意的教条主义,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在于使马克思主义充满蓬勃发展的活力,在所有的问题上回到马克思本身。

[收稿日期] 2006-07-13
[基金项目] 2005 年石油大学博士科研基金资助项目(Y050904)
[作者简介] 刘明文(1967 - ),男,内蒙古呼和浩特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卢卡奇对马克思本体论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徒期”的马克思本体论阶段,我们可以称为青年卢卡奇,其代表作是1923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这部著作被西方思想界称作“西方共产主义的圣经”。在这一时期,卢卡奇充满思辨的激情,带着西方哲学的传统,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开创了对马克思的哲学进行探索的新的方向,可以说,这是卢卡奇把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相对话产生的结晶。第二阶段是“成熟期”的马克思本体论,我们可以称为老年卢卡奇,其代表作是1973年出版的《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这一阶段,他多了一份冷静和沉稳,带着20世纪激烈的社会动荡的历史凝缩,把一生的经验和智慧都倾注到这部著作上,开创了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本体论路向。

卢卡奇确立了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不是没有根据的,而是有着深厚的西方哲学传统的。他早年曾受到席美尔、韦伯、李凯尔特、文德尔班的影响,晚年又受到哈特曼的影响,但是他的主要理论来源却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加上他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对当代哲学的本体论思潮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批判,从而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旨趣是本体论性质的。这一论断至今仍具有革命性的原则高度,因为其至少在理论上指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代性质的,而不是任何一种近代意义上的哲学,这种指证是在批判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确立的。

### (二)卢卡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与继承

在卢卡奇那里,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与继承,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来说不是一个旁支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本质性的问题。这一本质性的问题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意味着什么?在卢卡奇看来,对黑格尔的关系的实际意义甚至一直被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低估了。真正说来,“马克思的理论工作直接衔接着黑格尔遗留下来的理论线索。”[1]32或者用一句更简洁的话表述,“马克思直接衔接着黑格尔”[1]16。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辩证法是卢卡奇哲学研究的中心,历史、阶级意识、总体性、物化等范畴,都是建立在辩证法的基础上。尽管卢卡奇在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专制下做过多次的自我批评,诸如对自然的漠视,对劳动的遗忘,对实践的夸张,把异化等同对象化……所有这些,凝聚成了“当时流行于共产主义左派之中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1]12的观念,但是,卢卡奇对辩证法的坚持却是贯彻终身的。在卢卡奇那里,辩证法并不是传统教科书上的三大规律、五对范畴,而是包括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即具体的总体,只有从总体的视域出发,才能把现实理解为不断发展的社会过程,才能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然产生的拜物教实质。卢卡奇认为,马克思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改造,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的辨证关系体现了“最终哲学基础”,我们可以在原则上把它理解为关乎本体论的根基的问题,因为对辩证法的研究,乃是本体论的前导,“我试图对辩证范畴的真正本质和运动做出描绘,这会导致一种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1]22因此,卢卡奇对辩证法的考察,根本目的在于为马克思的本体论奠定革命批判的先导。

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卢卡奇认为,黑格尔的本体论存在着两个平行的本体论,即逻辑本体论和历史本体论,只有“历史本体论”才体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真理性内核,“辩证法作为历史的现实手段,已经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本体论上的重要性。”[2]533历史本体论是从范畴的过程性开始的。作为古希腊辩证法集大成者的黑格尔,是继赫拉克利特之后第一个给予现实生成比存在更多的客观本体论重视的思想家,“在那些伟大的哲学家当中,黑格尔决不是第一个有意识的辩证法家。但他肯定是——自赫拉克利特之后——第一个把矛盾当做最终的本体论原则的哲学家。”[2]532在黑格尔看来,普遍的充满矛盾的过程性在本体论上获得确立,使总体性范畴获得了一种本体论上的意义。总体性是整个现实建构的基本结构。过程性既是现实的,又是对现实的认识的决定性标志。现实是基于自身相对完整的复合体的总体性,贯穿在现实中的自我发展、相互作用和综合之中的是客观辩证法,作为现实总和的绝对就是过程运动。在绝对中,同一性和非同一性的同一不可避免地在起作用。这样,黑格尔的辩证历史本体论的核心内容明显地同他体系的逻辑等级结构相矛盾,“逻辑学和本体论的这种关系,是黑格尔的体系和方法的基本问题”[2]541。

黑格尔的历史本体论表现了黑格尔的天才猜测,这种猜测体现了黑格尔在一种普遍的历史推导中把握一切反思规定产生的总体性尝试。按照卢卡奇的观点,只有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方向,对黑格尔的本体论学说作唯物主义的倒转,才能发掘出蕴含在黑格尔历史本体论当中有价值的质料。

## 二、卢卡奇所确定的马克思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基本方法

### (一)总体性构成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根本的方法论

如何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唯物史观的置换？卢卡奇认为，这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通过彰显人类生活的总体性，马克思确立了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方法论原则。黑格尔在总体性上的失误在于把自我意识逻辑化为绝对知识。辩证的总体观之所以重要，在于它表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的方法论。即便是新的研究驳倒了马克思的个别论点，决不意味着马克思已经过时，“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1]47-48

辩证法的实质是什么？在卢卡奇看来，就是总体性，“无产阶级科学的彻底革命性不仅仅在于它以革命的内容同资产阶级社会相对立，而且首先在于方法本身的革命本质。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是科学中的革命原则的支柱。”[1]76这就是说，总体的优先性，体现了它在辩证法中的位置——革命原则的支柱。如果我们把辩证法理解为马克思本体论根基处的革命原则，那么，总体性思想必然是马克思本体论根基处的一个支撑点。

总体范畴是在批判“梅林—普列汉诺夫”正统的斗争中出场上，面对“梅林—普列汉诺夫”将马克思主义研究实证化的危险，卢卡奇指出：“不是经济动机在历史解释中的首要地位，而是总体的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科学有决定性的区别。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1]76解释历史发展的原则是经济还是总体性？卢卡奇选择了总体性，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没有什么独立的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等，只有一门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社会只有作为总体处在不断的运动之中，才能保证人类历史自我生成的完整性、连续性，因此，总体性的原则在辩证法中的首要地位是不言自明的，它是马克思辩证法的骨架，支撑着辩证法革命的批判精神。

“毫无疑义，《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重大成就之一，在于使那曾被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科学性’打入冷宫的总体范畴，重新恢复了它在马克思全部著作中一向占有的方法论的核心地位。”[1]15在此时，卢卡奇把总体在方法论上的优先性与经济的优先性截然对立起来，正如他在1967年新版序言中所说：“列宁在这个问题上真正恢复了马克思的方法，我的努力却导致了一种——黑格尔主义的——歪曲。”[1]15将方法降解为内容，我们看到了黑格尔把世界描述为真理的影子。比黑格尔更黑格尔化，这是卢卡奇对自己青年时的诊断。

（二）超越资本——卢卡奇对总体性方法的实践探索

老年卢卡奇力图对将方法与内容对立起来的失误之处进行正本清源。总体性不是静态的整体，它侧重的是动态的辩证运动。一个人对某一历史事件可以做出精确的描述，但是，如果他不懂得这一事件在历史总体中的作用，仅仅把它看作孤立的事件，那么他就不懂得总体性的原则。

卢卡奇认为，马克思在青年时期就已经拒斥了黑格尔在逻辑上的先验图式，表明了把社会存在诸要素具体化的实践作风，“这些倾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得到了它适当的表述，手稿的这种开拓性的创见特别在于，这里在哲学史上第一次使经济范畴表现为人类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范畴，从而使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社会存在进行本体论的阐述成为可能。经济学作为马克思本体论的中心，决不意味着他的世界观是‘经济决定论’。”[2]641只有对马克思的哲学方法一无所知的追随者那里才会出现把马克思的经济学知性化的做法。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纯粹的经济学体系，存在的是以辩证法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决没有仅仅局限于这个问题，因为对价值、货币等的本体论起源的一种严格地科学描述由于是纯具体科学的探讨，可能会产生现实的历史过程的一种纯粹合理性的假象，从而歪曲这一过程的本体论本质”[2]675。不幸的是，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如伯恩施坦之类，即是“以精确科学的名义攻击辩证法”的典型代表，他们所做的努力就是以实证科学的理论覆盖马克思主义哲学，达到把黑格尔辩证法不留痕迹地清除在马克思主义门外的目的。

以精确科学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予以知性化的做法，不啻于是对总体性方法的背叛。以经济学而言，资产阶级学者把经济学仅仅当作一门纯粹的具体科学，在一种人为的孤立中分析其现象。相反，“马克思的经济学总是从社会存在的总体出发，并且总是再次回到这种总体性之中。”[2]648“《资本论》是以试验的方式充分设立纯粹合规律的和抽象地同质的规律联系及其影响，直到通过逐渐地播入更广泛、更接近现实的成份而扬弃它们，最终达到社会存在的具体的总体性。”[2]669《资本论》的结构在于把经济理解为社会存在中心，第一卷告诉我们，只有劳动力才能创造新的价值，生产资料、原料等在

劳动过程中只是保留自身的价值;第二卷把价值予以具体化,价值只有在全过程之中,才能保持价值规律的有效性;第三卷注重个别行为在整个循环中的调节,这是由于生产力的作用在个别行为的价值降低后得到增长,资本存在着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转移的可能性,这是以社会生产的较高发展阶段为前提,表明了经济范畴在社会存在的运行中体现了一种发展了的存在。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的哲学以总体性体现为经济学批判的基础,而经济学批判则是哲学原理的展开,这就为我们理解超越资本提供了一种现实的思想资源。在以资本原则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工具理性把一切都纳入到可计算的合理性当中时,所反映出来的本质恰恰是总体性的缺席。

总之,总体性作为社会存在最基本的认识方法,要把自己体现在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社会物化现象的深刻揭露,对第二国际内流行的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经济化的尖锐批判,对历史、实践、阶级意识等观点的论述,对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前景的展望,都运用了总体性思想,"辩证方法不管讨论什么主题,始终是围绕着同一个问题转,即认识历史过程的总体。"[1]85 因此,总体性的在场,是我们分析社会存在的一个基本的着眼点。

**三、卢卡奇本体论思想渊源的现代启示**

从本体论思想的理论承继上,卢卡奇告诉了生活在现代性中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精神依凭——不仅需要黑格尔这样的深邃思想家,还需要马克思作为我们的导师和旗帜。由于《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篇幅较为浩大,1971 年《匈牙利哲学》杂志在当年的 1 – 2 期和 3 – 4 期上连续发表了《本体论》第三章,即黑格尔的真假本体论。1973 年 5 月单行本在德国的路希汉特出版社出版。1978 年英文版首先翻译了"黑格尔的真假本体论"和"马克思的本体论的基本原则"等三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卢卡奇本体论思想的理论渊源在他所要确立的社会存在本体论当中的重要性。

对卢卡奇来说,探讨和确定马克思的社会存在本体论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工作,"虽然这看起来有点不合情理,现在在我年逾八旬时,我要开始我的最重要的著作写作。"[2]3 只要我们想一想一个人 79 岁的时候,而且还是在身患绝症的情况下,依然勤于掇笔、口授,我们的心中必定会对这样一位老人充满敬意。可以说,卢卡奇在用自己的执着演绎着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基本原则。通过他的开拓性耕耘,至少在以下方面形成了对我们富有意义的启示。

第一,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不能拘泥于马克思的个别结论的不正确来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然而在学术界,对任何信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表白报以冷嘲热讽已逐渐开始成为一种时髦。"[1]47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就面临无情的斗争和围剿——不仅来自资产阶级,也来自无产阶级内部。尤其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边缘化",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反马克思主义等各种现象时有表现,又如说李锦在他的大作《马克思主义新发现》中以"三个代表"的名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却又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还标榜什么"理论创新"。再比如阿尔文·托夫勒在其著作《预测与前提》中把马克思看作旧的第二次浪潮社会也就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并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来诊断高技术社会的内部结构,就像在有了电子显微镜的时代,还是只用放大镜。这就需要我们时刻在思想上提醒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不能放松。

第二,在如何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要把马克思的思想与本国的文化传承相链接。如果我们在思想上借口坚持马克思主义,而否定任何形式的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失去发展的生命力。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越深刻,就越容易在某些方面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卢卡奇而言,由于他接受了德国的文化传统,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即已提出他所要创建的马克思主义本体论应该是一种对话性质的,"如果我们允许浮士德的胸中藏有两个灵魂,那为什么一个常人,当他在一个世界性危机中从一个阶级转向另一个阶级时,就不能肯定他的内心不会泛起各种彼此冲突的思想潮流呢? 至少,我觉得就我能够追忆的那些岁月来说,我的思想一直在这样的两端徘徊:一方面是吸收马克思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另一方面则是纯粹唯心主义的伦理成见不断增强。"[1]3 通过马克思的辩证法来拯救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这是一种解释学的对话原则。在对话中,将真理呈现出来。

第三,对时代的热点疑点问题必须作出回答。当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妄图以本体论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卢卡奇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本体论思想,马克思的思想在最终意义上都是关乎本体论性质的。"一方面,任何一个马克思著作的公正读者都必然会觉察到,如果对马克思所有具体的论述都给予正确的理解,而不带通常那种偏见的话,他的这些论述在最终意义上都是直接关于存在的论述,即它们都纯粹是本